

毛泽东诗词创作与中国现代文化转型

李 荣

(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8100)

[摘要]毛泽东诗词可视为现代文化转型进程的侧面展示。毛泽东诗词创作体现了现代文化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因素的扩展和下移趋势以及现代文化所追求的展示自我、倡导革新的文化理念,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化转型进程中所存在的文化割裂和发展不均衡现象。

[关键词]毛泽东诗词;现代文化;文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2)04-0133-06

Mao Zedong's Poems and Chinese Modern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LI R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8100,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s poem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side show of the modern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It demonstrates the extension and downward tendency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t also shows the culture conception of self presentation and innovation which are pursued by the modern culture. It deeply reflects the phenomena of cultural separation and imbalance in the modern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Key words: Mao Zedong's poems; modern cultur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现代历史阶段中,中国仍延续着近代以来整个社会从农业形态向现代工商业形态的经济转型、专制式国家体制向现代民主共和体制的国家形态转型、封闭锁国向融入全球体制的社会思潮转型等一系列态势。与此相应的,则是文化形态方面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于外部侵略,中国现代社会的诸种转型均非完全自然地民族内在发展进程中诞生,因此,此过程充斥着内外、古今、中西等多种因素的冲撞,表现在文化层面,就呈现为转型内容的复杂和转型过程的艰难。

毛泽东是现代历史阶段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其生命历程基本与中国现代文化转型过程同步,研

究他的文化表现也就因此具有了极大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即试图以毛泽东诗词创作为中心,关注其创作行为的文化属性,探讨其与中国现代文化转型进程的关系,探究其表现对推进文化转型进程的意义。

一 毛泽东诗词创作的文化属性是现代文化转型进程的侧面体现

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是继清末以来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的中国革命进一步深化的结果。毛泽东个人的革命历程几乎伴随了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全过

收稿日期:2012-04-04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经典阐释与建设当代民族精神研究”(2010ZDXC08)

作者简介:李 荣(1978-),女,重庆人,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程,天然的就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转型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其诗词创作本就是作为社会活动实践家对这一文化进程的无意识回应,现代文化转型过程的某些特征在毛泽东诗词中有着明显而深刻体现。

(一)从作者所属的文化阶层而言,毛泽东诗词创作体现了现代文化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因素的扩展和下移趋势。

现代文化转型,本质上是在人的生存方式因技术系统的巨大变革而导致的生产力大解放背景下产生的。技术解放使得个体解放成为一种呼声和潮流,表现在文化方面就自然而然体现为对于古典社会形态下少数阶层占有文化优势的状况的不满。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内容之一就是顺应时代文化需求,打破封建时代文化为士绅阶层所“垄断”的态势。毛泽东诗词创作即是此文化发展趋向的侧面表现。

古典式社会形态中,阶级的严格区分及由此形成的占优势阶层对于文化的专属,诗歌创作因之基本上成为占社会少部分阶层的事业。这种文化专属倾向是所有阶级社会必然存在的现象,文学形式的“雅”“俗”区分正是社会阶层内在分割的体现。而随着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民众体力智力的解放,个体对于自身文化权益的要求也逐渐生发,民众对于的文化的拥有权要求也因之而起。社会自上而下都出现了打破文化隔膜状况的要求,传统文化因素因而逐渐进入普通民众视野,出现了扩展和下移趋势。诗词创作作为文化表征之一,即体现了此种特征。

对于传统诗词创作,现代文化革新者们曾表达了不同的态度。影响力最大者当属新文化运动所传递的激进观念,即对于传统诗词创作极力否定的文学主张。由于传统文化在当时普遍被视作是阻碍社会发展进步并需要完全扫除的对象,传统诗词也因而受到波及,受到极其强烈的批判。诗人臧克家就曾回忆说:“以前,新诗人对旧体诗看法有点偏颇,认为新诗人写旧体诗是一种倒退,是‘反动’。对于郭沫若同志写旧体诗,新诗友们私下议论纷纷。”^[1]吴宓也自述其遭遇,“予所积盈篋,无地刊

布。……欲编成《近世中国诗选》一书……但今各家书店,以及学校、机关,无愿为予担任印行者。”^[2]传统文化普遍遭受批判与质疑是传统诗词创作被排斥和被边缘化的文化背景,这种状况甚至一直延续至今。

从思想延续性的方面看,毛泽东的文化主张无疑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者们的思考方向。他对于新体诗歌的认识即表现了此点。毛泽东明确的意识到了新诗(白话诗歌)所具有的文化含义,因而他明确提出“旧体诗词的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我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3]然而,既然传统诗词不能代表新的文化发展方向,那作为革命领导者的毛泽东又为什么不肯放弃这种形式的文学创作呢?这种状况当然可以从不同方面予以解释。如果将之放在现代历史阶段中传统文化发展的角度,联系毛泽东本人所属的社会阶层,可以得到另一种理解。

如上所言,传统诗歌此时正因其传统文化载体的身份而受到强烈排斥,那么,在这种时代文化氛围中依然选择以此形式进行创作的作家,其本身的行为就彰显了一种强烈的文化意味。若细细检索现代历史阶段处于文学暗流状态的传统诗词创作可以发现,此时作家们的身份属性出现了明显的泛化倾向。以《民国旧体诗论稿》、《二十世纪中国诗词史稿》等专著为根据,此作家群体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所属文化阶层更是极其广泛。既有出身于传统士绅阶层的专家学者而自身专注于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如陈寅恪、钱钟书等,也有与传统士绅阶层有所联系但更注目于新文化运动的文学创作者,如老舍、郁达夫、郭沫若等,更有出身于传统乡农阶层而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实践者,如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

毛泽东出身于传统农民阶层,其创作是对个人参加中国革命历程的叙写,其创作技巧锤炼的动因出于个人兴趣而非如以往士人一般是为科举进身进行准备。与其他类型作家相比较,毛泽东等人所属的社会阶层并不属于传统上的士绅类文化阶层,但他们竟然不约而同地对于传统诗词创作具有浓厚兴趣,这不能不引起注意。这种现象至少说明,

此类文学形式创作在当时已不再专属于传统社会中的文化优势阶层而成为一部分民众所关注的对象,传统文化因素已经逐渐进入民间并与越来越普遍的人群发生联系。也就是说,当作为强势文化的传统文化在社会中的权威地位丧失后,其内在的魅力反而得到彰显并得到了超出传统专属阶层的中国民众的接受。这正表明了现代文化转型的趋势:在文化转型进程中,社会其他阶层已经进入以往为少数阶层所垄断的文化空间,反过来说,即原本只为少数阶层所掌握的某些传统文化成分在某种程度上正进入民间并为越来越多的民众享有,文化转型的大众化要求也在这个意义上得到了一定呈现。

(二)从作品所展示的精神实质来看,毛泽东诗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文化所追求的展示自我、倡导革新的文化理念。

中国现代文化进程的目标,就是寻求民族国家的独立,建立具有“现代性”的中国文化形态,即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建立起对社会历史和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当反思与批判成为现代文化主导精神时,对于个体精神的彰显,对于现有社会精神文化的不断革新就成为必然。《新青年》1915年9月发刊词中倡言“新青年”的六大标准: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每一条都针对传统文化积弊和时代革新要求而生,都与个体自我的革新和发展相关。毛泽东就是在这种时代文化氛围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的诗词创作在形式上趋向于传统,但作品的内在精神特质及创作理念却已经发生了巨大变革。

和同时代其它人一样,毛泽东已经背离了传统封建士大夫的人生轨道,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在他这里,诗歌不再是单纯的抒情言志的形式,更是用来表现处在革新变化中的世界的个人新的人生理想和人生选择的手段。五四时代自信进取,张扬个体精神的文化倾向在毛泽东诗词中有着鲜明体现。毛泽东诗词总体数量并不很多,题材内容却很广泛,有征战、赠答、登临、咏物、悼亡、咏事等多种类型,而其精神内涵,则远远超过了传统文人以书斋为人生中心的范围,是对艰难漫

长的革命历程的记述,是个体实践革命理想过程的传扬,虽偶有低沉缠绵之作,但更多的却是个体在困境面前毫不屈服、勇于进取精神的传达,表现出明显有别于传统的情怀。如其早期创作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显示出的五四新青年特有的时代豪情与潇洒风姿:“君行我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丈夫何足事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爱情词《贺新郎》(挥手自兹去)中对自我的期许:“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倪儿女语”,《沁园春·长沙》“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中展示的风发意气,再比如在自身参与的革命遇到重大挫折时,《菩萨蛮·黄鹤楼》所展示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的昂扬等。在毛泽东诗词中,对自身力量的自信和乐观,对未来的锐意进取处处可以感知。在这些诗歌中,毛泽东反映的是自己参加革命的诸种感受,但是表现角度却并非是纯粹政治情感的抒发,而是体现了作为大时代参与者的个体的精神状况,内在气质上凸显出一种个人力量的张扬。这种表现,正与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自由的”“进取的”“实践的”文化要求相呼应,无不体现出现代历史阶段中社会、政治、文化诸种权威被打破后青年人所呈现出的张扬个体的精神状态。

而且,在毛泽东这里,新的时代精神的抒发是通过被很多文学革新者视作“酸腐”“虚假”的传统诗词形式加以表现的,尽管毛泽东本人也对旧体诗时有微词,但这种创作形态本身至少就体现了出一种和完全否定传统主张不同的文化态度。毛泽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者们多排斥传统诗词创作的时代氛围中用自己的创作在实际上彰显了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理想相结合的另一种可能的文化革新理念。

二 毛泽东诗词创作的文化价值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复杂性与艰难性

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型是在复杂的国内外社会环境中进行的,这注定了此进程本身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因此,作为此过程的参与者,毛泽东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行为也就不可避免的体现出了这一特征。

(一)从作者个人写作的整体性角度看,毛泽东诗词写作与其文章写作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这是社会内在割裂性作用于个人行为的表现。

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型是在整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发生的,现代所特有的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不可避免的作用并表现在这一文化转型进程中,因而更增强了此进程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特征。从毛泽东个人整体的写作行为方面即体现出了这一点。

如果将毛泽东作为完整个体来看待就会发现,其写作行为本身存在着明显的割裂倾向。

研读毛泽东诗文创作,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在于,他的文章主要反映作者个人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理论思考成果,诗歌则主要表现他亲身参与历史变革过程的情绪感受。也就是说,其文章主要是因应外在需要而创作出的产物,是为宣扬政治见解而生,而诗歌主要是个人化产物,是为表达自身情绪而作。二者在所表现的内容方向层面存在极明显差别。追溯中国文学传统,类似于毛泽东的这种诗文创取向不同的现象古已有之。所谓文以理为主,着重于传递理念,诗以情为重,更多是传递情绪。诗文用途的不同导致了其创作方式的不同,这也是所有文明社会必然要造成的人理性与感性相割裂现象的结果。然而,即使如此,毛泽东诗文内容的分裂程度仍远远超过前代。古代作家用同一文学形式既表现实用性社会性内容又表现个人化感性化内容的现象在毛泽东这里并不存在。

这固然与毛泽东身为革命领导者的主要社会身份有关。但如果放在现代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这种现象又可以得到另一种解释。在进行白话文章写作时,毛泽东属于现代文化概念中的公共人物,他的写作,面向的是广大民众,写作目的,是力求自身的革命见解得到民众的理解并得以传播。但当他进行传统诗词创作时,他的写作就属于个人行为,是为满足自身情感抒发需要(至于写出来之后的传播属于另一层面问题)而进行的。这表明,个人的身份属性随着对象的不同而发生明显改变并由此影响了书写方式和书写内涵的变化。也正是如此,作为人的完整性属性就被分割,集体化的

个人与个体化的个人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这种现象正是现代社会割裂性特征作用于个人的体现。

而且,联系中国现代文化转型进程所面对的复杂状况,毛泽东这种诗文内容分割状况还表明:由于中国现代文化是在外来文化的强烈刺激而产生的裂变中进行的,政治文化可以因外在压力而在较短时期内完全改变,但一个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和心灵状态则很难短时期内变化;外在政治社会层面的内容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生改变,但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则与民族意识深层有着更紧密更深刻的联系,很难在短期内发生较大改变。所以,面向政治社会的白话文体能很快普及并适应环境,而诗歌这一表现个体精神状态的文学形式则在很长时间内都存在着发展方面的疑问。

中国新诗自从新文化运动起始就是关注的重点之一,但即使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和参与者们也不断表示其发展的缓慢和成果的不如人意。“运用口语(或接近口语的语言)而不疏于松懈、散漫、噜苏,对于诗人来说却是一个相当严重的考验……可是从‘五四’到目前,也有不少作品没能够顺利地通过这一关”^[4]，“许多一向写新诗的人,或则现在都有作起旧诗来了,或则在写新诗之余,间或写几首旧诗,而这很少的旧诗每每比他自己所写过的很多新诗好”^[5]之类感叹一再出现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的口中。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对新诗创作提出批评:“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6]“现代的新诗不能成形,我反正不看新诗”。^[7]这种种表现固然与白话文学尚在探索之中,从时间方面来讲无法与已发展了数千年之久的古典文学相比肩的因素有关,但另一方面,却也表现出新的语言形式在表现个体心灵及精神状态方面的不足。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骤然被外界力量逼入现代历史阶段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用语言妥帖表达自身的能力,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外界发展无法实现平衡。

可以说,毛泽东诗词创作与其文章创作之间的分裂提醒我们,现代社会中作为个体的人对新时代的内在适应性问题应该从文化高度上予以关注。

(二)从他者接受的角度看,毛泽东诗词创作的文学评价与其在文学史序列中的地位存在明显分裂,这也是了文化发展内在不均衡性的表征。

毛泽东诗词自为大众了解之日起就获得了广泛关注。这无疑与作者本人在中国现代革命历程中所享有的突出地位有着密切关联。但无可否认,毛泽东诗词确实也有着自身独到的魅力。在他的创作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激情,而这种情绪又因传统形式的使用受到某种限制,从而形成一种既奔放又克制的美学效果,既带着时代赋予的个性张扬的意味又在形式上具有某种内敛含蓄的回味余地。“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那些诗词如同厚厚的冰雪融化后萌发出来的强劲小草。他的诗却是同他的政治行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与政治行动紧密联系的诗未必都是好诗。因此,他的诗词的优美几乎是像火与水、天与地合为一体迸发出威力无穷的奇观。”^[8] 艺术上的成功是毛泽东诗词取得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内因。如此,则各种毛泽东诗词鉴赏著作及专论等不断问世就可以理解了。甚至近几十年来,毛泽东诗词还被译成英俄德法日等多国文字,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毛泽东诗词热”。

然而,正由于毛泽东个人身份上的特殊,且当今的社会仍处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延续过程中,这种“当下”环境和立场对国内研究者的制约仍表现的极为明显。“人们不得不从不同于纯个人诗集的角度去把握毛泽东的诗集,这是由于诗本身和作者本人的社会性决定的。”^[9] 在毛泽东诗词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的时候,各种现代文学史却仍把他排除于现代文学创作者行列之外。而这也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现代传统诗词创作者们在中国现代文学表述序列中的共同命运。

对于传统诗词为什么不能被纳入现代文学史,有这样一段论述很值得关注:“现当代格律诗词一旦纳入现当代文学史,我们的文学史就不再主要是现当代作家创造的文学史,大量的党政干部、画家书法家、学院派教授、宗教人士将占据我们现当代文学史的半壁江山。”^[10-11] 与此相对的则是这样一种看法:“这种观点显然让人无法苟同,能否进入文学史的主要依据不应当是作家的身份,而是其创作

实绩与文学主张……现当代文学史应当是全民的现当代文学史,而不是专业作家的现当代文学史。”

以上两种意见各有其立场和根据。第一种是出于对文学独立性的忧虑而发,目的在于对现实中非文学因素侵入文学领域现象的抵制,第二种则是试图站在广义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角度对各种不同的文学创作现象予以包容,目的在于扩展现代文学的认识广度。在当今“新文学”已经完全确立地位的形势下,这种意见上的分歧,从文学评论的角度,实则反映了传统诗词在进入现代文学体系时评价标准确定性的丧失。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作家身份从来都不会成为一个问题。由于传统士人“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念、个人对政治几乎是天生的认同性格以及文化权利的的相对垄断和文化行为的整体性,中国古代文学作家中的绝大多数都具有官员兼文学创作者及其他门类艺术家的身份。这种表现正与现代社会相悖:在现代,随着社会分工的加强及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强调,文学创作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成为“专业作家”的行为,作家身份的认同在此时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现代文学与古代文所面临的创作环境的巨大差异才是形成现代传统诗词接受悖论现象的内在因素。也就是说,在文学话语论争的背后,涉及的仍然是一个文化问题,即文学创作者个体身份认同的改变。古今巨大差异使得“为了将旧体诗词写入文学史,需要的是有一个能够容纳旧体诗词的现代文学史。为此,作为现代文学,首先必须确立起评价旧体诗词的基本标准,这好像并非说说而已那么容易……首先需要的是把旧体诗词纳入到现代文学这一公共空间中去的行动,或者相反营造可以容纳旧体诗词的公共空间。”在现代文化发展进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的决裂态度很大程度上造成旧体诗词的边缘化地位,由之更造成其评价标准的丧失,进而使得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者在现代历史阶段数量庞大的传统诗词作品面前失去整体把握能力。毛泽东等人的创作无法进入文学史与此不无关系。

再进一步,之所以有研究者担忧“大量的党政干部、画家书法家、学院派教授、宗教人士”会借传统诗词而进入现当代文学史书写领域,正在一定程

度上表明当前传统诗词的创作正多集中于上述群体之内。其原因,固然与社会因素相关,但也反向说明,将传统诗词创作排斥于现代文学序列并不能完全消除此种文学创作现象,反而更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此创作形式的小团体化倾向,使得这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与普通大众的距离更加遥远。如果把文学看作是文化的表征之一,则此现象表明中国现代文化转型进程中仍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现象,普通民众的文化权益仍未能完全得到伸张,传统文学和文化仍没有成为全民共享的对象。正是因此,对“党政干部、画家书法家、学院派教授、宗教人士”等文化占有与享用者的身份关注才会如此鲜明的成为一个问题。从这个角度,以毛泽东诗词创作为代表的传统诗词创作不能进入文学史书写,实际上提醒了文化建设者们,应警惕现代文化发展进程中的文化割裂现象。

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型和发展不是民族文化正常自我更新的结果,而是在外来危机之下的带有强烈导向性的选择,当拥有广袤地域和不同经济及文化发展水平的中国在同一时间被逼入到这个发展进程中时,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发展不均衡会对文化发展严重影响,民族文化本身因社会的复杂化而呈现出团体化阶层化的倾向,现代社会进程中的文化割裂现象将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表现的更为剧烈和复杂。这种现象应引起今天致力于民族文化建构的研究者们的注意。在此意义上,毛泽东诗词创作正为中国现代文化转型提供了一定借鉴。

参考文献:

- [1] 臧克家. 臧克家旧体诗稿·序[M]. 武汉:武汉出版社, 1988:31.
- [2] 吴 宓. 吴宓诗话·空轩诗话缘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77.
- [3] 舒 湮. 我又见到了毛主席[M]//郑广瑾,杨 宇. 毛泽东诗话[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173.
- [4] 臧克家. 精炼·大体整齐·押韵[M]//臧克家. 克家论诗[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社,1985:87.
- [5] 萧 三. 论诗歌的民族形式[M]//匡匡汉,刘福春. 中国现代诗论[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373.
- [6] 毛泽东. 毛泽东书信选集[M]. 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608.
- [7] 毛泽东. 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C]//陈 晋.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1613.
- [8] 武田泰淳,竹内实. 诗人毛泽东·后记[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9] 王富仁.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问题的几点思考[J]. 文学评论,2000(5):34-43.
- [10] 苗怀明. 要宽容,还是要霸权?——也说现代旧体文学应入文学史[J]. 粤海风,2001(5):10-13.
- [11] 木山英雄. 当代中国旧体诗词问题——从日本的角度观之[C]//东亚人文:第一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59.

责任编辑:李 珂